

11.10

台州方志述略

台州地区地方志办公室
临海市博物馆 编

台州方志述略

台州之名起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但作为一个单独的行政区划，却可上溯至汉昭帝始元二年（-85），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其管辖范围和建置分合屡有变动，至唐代以后才相对稳定。目前全区辖二市（临海、椒江）六县（黄岩、天台、仙居、温岭、玉环、三门），其中临海（1986年改市）、黄岩、天台、仙居均为唐以前所建，温岭于明代成化五年（1469）建县，玉环于清代雍正六年（1728）建厅、民国元年（1912）建县，三门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建县，椒江则在1981年建市。

台州方志也起源甚早，而且种目繁多。据项士元（元勋）《台州经籍志》（订补本，下同）等书记载，仅是府县志即有七十部左右，如果加上村镇志、山水志、寺祠志等，总数就在一百五十部以上。

方志是记载一个地方社会历史情况的书，有极为丰富的内容。认真地总结它，研究它，对今天的两个文明的建设，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借鉴。但由于它们都修在旧时代，不免精华与糟粕杂呈，则需要我们加以认真辨析。本文打算对台州方志的发展情况作一初步探讨，借以抛砖引玉。同时对存佚的情况作些补注。学识浅陋，谬误难免，谨以就正各方。

(一)

台州方志的发展，大体上经过四个阶段。我们把它说成为雏形期、发展期、衍变期和定型期。所谓雏形期，时代相当于汉至南北朝，发展期相当于隋唐至两宋，衍变期则指元、明、清以后属定型期。这种分期同全国许多地方的情况不一定相合，本身的提法也可商讨。这里主要是为了叙述方便。

雏形期事实上还没有真正的方志。但统治者为了行政的需要，却已编纂了分限于各个部份的类似著作。大约有三种类型：一是地记，或称图经、形书。这是一种簿吏之书。因为上地山川是统治之本，所以这类著作由来更早。二是风土，包括物产等，这是为了贡赋之需。三是人物，汉以来有许多所谓先贤传、耆旧传等，它反映了一地的人文。这种人物传最初是九品中正制下的产物。上述三个内容实际上也就是以后方志的三个来源。

台州在这一时期的著作，现在可考的有两部。一是三国·吴·沈莹的《临海水土异物志》〔注1〕。此书约作于公元264至280年之间，早佚。明、清台州学者陶宗仪（约1310——1395）、杨晨（1845——1922）及近人蔡骧（1865——1956）等均有过辑录。1981年农业出版社出版的张崇根《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所辑内容更多。从现有内容看，以记物产和风土为主。其物产部份，包括动植物，尤以海生鳞介为突出。足以窥见古代人们认识和利用自然物并对之进行鉴别和命名的科学能力。其风土部份，记述了夷洲（今台湾）、安家（古越族）、毛民、狼獾民等古代民族的风俗历史。其“夷洲在临海东，去郡二千里”这一记载，则可能与台州的历史有很大关系。借此可知当

时临海的章安(今属椒江,古章安县及临海郡郡治所在)是孙吴时与台湾交通的一个海口,孙权黄龙二年(230),派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远规夷洲”,说不定就是从章安出发。因为地理位置重要,又可能导致了孙亮时临海郡的设立,也于是有出现这部书的可能。

另一部是《临海记》〔注2〕。这部书也已早佚,并且历来“史志俱不著录”。清·洪颐煊(1765—1837)搜幽剔隐,辑出遗文二十九条,收入洪氏《经典集林》中。洪氏当时还“未详撰人名氏”。张崇根据《北堂书钞》等书,考出作者是刘宋时孙诜。(见张著《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代自序》)从现存二十九条辑文看,二条记沿革,二十六条记山川,一条记物产。某些记载相当准确,如云:“临海山,山有二水,合成溪,曰临海。一水是始丰溪,一水是东女溪(按:郭协寅校《嘉定赤城志》云“东女”为“乐安”之形讹,是。——引者),至州北(按:刘宋时尚无台州之名,此州字当为后人所改。),两溪相合,即名临海溪。”同现在的地理状况完全相合。这个描述还给临海两个历史地理疑案提供了资料。其一即临海山究在何处,临海何所取名?原来此书所称的临海山即现在临海城北十公里的白马山,由于上游两水于此相合,海潮也正好到此而止,所以有此名。这符合认识的实际,同时也为纠正历来相传的临海山在东北海中的飘渺之说提供了文献的依据。其二,是说明现在的临海城关在刘宋时已有可能是郡治所在了。《南史》记孙诜其人“好文,尤赏泉石”(《南史》卷七十二《丘巨源传附诜传》),这些记载或是他亲身经历所得。书中间或记些神话传说,则因其体裁系从《山海经》而来。

这里附带谈一下关于所谓后汉杨孚的《临海水土记》问

题。此书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但却有不少书目著录过。如《广东通志》和姚振宗的《后汉艺文志》、项士元的《台州经籍志》、洪焕椿的《浙江方志考》等。察其来源，《台州经籍志》系本于《广东通志》，《浙江方志考》则本于《后汉艺文志》，而《广东通志》、《后汉艺文志》又皆本于黄佐的《广州先贤传》和区大任的《百越先贤志》。依二书所说，杨孚是南海人，汉章帝时（公元76—88）为议郎，后官临海太守，著有《南裔异物志》和《临海水土记》。但黄、区均为明代中叶广东人，他们的这种说法至今尚无人找到更早的根据。而据明以前文献如《隋书经籍志》，仅称杨孚为“后汉议郎”，著有《异物志》及《交州异物志》各一卷（二书后人也有疑为一书的）。又从《续汉书五行志注》中，知杨又著《董卓别传》，为灵帝、献帝间（168—220）人。则时代与黄、区所说既别，其事行更与临海相远。况临海立郡始于三国吴太平二年（257），汉时尚无临海之名，自不能有以临海为称的书。因此，说历史上无杨孚《临海水土记》这本书，是完全成立的。清代学者也对此书有疑问。如侯康、顾櫰三所著两本同名的《续后汉书艺文志》就不著此目。姚振宗虽采用了，但也表示其书“名目恐亦未确”，怀疑“临海”乃“南海”之误。明人著书，好凭记忆，信笔所之，以致张冠李戴之事常有。此自可备一说。不过姚又推想或“汉时尝立临海郡，后复省，並史失其事欤！”却是一种自求立论无失的圆转之词，是不足为凭的。

（二）

隋唐帝国的出现，给古代中国开创了一个新局面。中央对地方的管理也相对加强了。为了统治的需要，全国性的地

志汇纂工作相继产生。如隋代有《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诸郡土俗物产》一百五十一卷，《州郡县簿》七卷；唐代有《区宇图》一百二十八卷，《诸郡土俗物产记》十九卷，《元和郡县志》四十卷等。这些志书大体上都有地方所上的图牒依据。但除《元和郡县志》外，基本上都失传了。唐代见于史志的还有《润州图经》、《歙州图经》等地方性的图经，敦煌遗书又有《沙州图经》等。图经这个名称起于汉，到了宋代更大行一时。属于台州可考的就有《台州图经》〔注3〕、《重修台州图经》（李洎孙纂）、《临海图经》〔注4〕、《〔祥符〕黄岩图经》〔注5〕、《〔祥符〕天台图经》〔注6〕、《〔嘉泰〕天台图经》〔注7〕（宋之瑞撰）等六种，均已失传。另有《〔祥符〕台州图经》一目，见洪焕椿《浙江方志考》，云《〔嘉定〕赤城志》卷二《地理·乡里·黄岩靖化乡》条所引。然《赤城志》所引只云“祥符图经”，未指明何处。今《浙江方志考》径作台州，並云“此书当为李宗谔所修，成于大中祥符三年”，似有未妥。因此条所记为黄岩事，如引台州图经，必当标出台州之名；若引黄岩图经，则黄岩二字依例可省，故定为黄岩图经较当。洪氏或者以为《赤城志》它处已有祥符黄岩旧志的记载，此处之《祥符图经》必为台州图经无疑，这也不然。因为古人一书多称常见，《赤城志》即有“图经”“旧志”混称之例。所以这一假设是不成立的。

以志命名的也有出现。尤袤《遂初堂书目》有《台州三县志》一目。《民国台州府志·艺文略》等均认为宋人撰，並無依据。近人周琮在《民国临海县志·序》中指出：台州之名为台州及台州分为临海、章安、南始平三县是唐高祖武德五年（622）事，至武德八年（625），三县均废入

临海。则此书当撰于武德五年至八年间。这说法很有道理。

志的出现是一个跃进，因为在主导思想上有了很大的突破。其名虽起于汉，但这个任务大概是宋人完成的。

现存台州最早的方志是宋代的《嘉定赤城志》。作者陈耆卿在自序中就把前此之地志等，称为“有司之所急”，而他们的修志则是“君子之所急”。这就把方志从原来簿书吏牍的范畴升到了史的地位，把仅仅供官府统治诛求之需转变为鉴往开来，促进地方发展之用。如《赤城志》的创修者齐硕的跋所说，非惟“补职方氏之缺，虽山川人物亦将由是而发扬”，“其为益于台也，深矣！”我们以为，宋代的政治总的来说比唐以前为修明，宋代统治者注意到地方的开发，在相当程度内消除了以前存在的畿甸边鄙的人为鸿沟，这是各地方志得以普遍出现并使之能服务于地方发展的客观条件。

宋代台州方志可考的（不包括宁海，下同），一共有十部，现在传下来的只有《〔嘉定〕赤城志》〔注8〕一部。此外，《赤城续志》、《赤城三志》等，还有吴子良、王象祖二序可考。《续志》、《三志》均为继《赤城志》而作。《赤城志》是全国现存二十余种宋代方志之一。作者陈耆卿（1180—1236）字寿老，号笈窗，临海人。他登嘉定七年（1214）进士，官至国子司业；曾受学于叶适，著有《笈窗集》。他取志名为“赤城”，是因为天台有赤城山，相传萧梁曾以此名郡。（按：此说出《太平环宇记》，实不可靠。）全书共四十卷，分十五门：地理、公廨、秩官、版籍、财赋、吏役、军防、山水、寺观、祠庙、人物、风土、冢墓、纪遗、辨误。某些门下分列子目，门或某些目各冠小序。编写的方法是分门分县叙述，合则为总志，分录

则成县志。

陈氏有经济之学，又擅长文笔，所以他的志颇有可观。《四库全书总目》称他“文笔法度，具有师承，叙述咸中体裁”。清代台州学者宋世莘在重刊本书序中也说他“词旨博赡，笔法精严”。他的小序每篇数百字，篇篇精警。许多篇章传达出他修志的“微言大义”。如地理门馆驿、桥梁两目的小序云：

自城郭至坊市，居者之适也；自馆驿至津渡，行者之便也。郡自天台径越，自黄岩径温，自宁海径明，自仙居径括，车联毂击；径行者无艺，昼涉夜憩，诘容顷刻失其节哉！余观南方治一桥，费缗钱辄十数万，它郡馆舍，亦辉敞相望，是州独寥寥焉，杰然者一二而已。然因其旧而崇葺之，毋俾兹坏，自足以纫吾邦之缺，而不必深艳乎其它也。即是一端，亦足以观政矣。（卷三）

他把交通行旅之事提高到可以“观政”的地步，不“深艳”即所以“深艳”，这对地方官是一种鞭策。又在山水门立水利一目，序云：

迂书《河渠》，固志《沟洫》，得不以水利吾民之命，不容不备录之欤！每念古郑白之俦，出意疏凿，有以一渠而溉田千顷者；接于近世，非惟不能图新，而並与其旧失之矣。台虽号山郡，所在陂塘良众，顾以豪吞富噬，日湮月磨，每岁邑丞汇申，按败纸占名惟谨，何惜兴坏；以故甫晴虞雨，方雨虞潦，盖人力不至，而动责之天，宜其少乐岁也！余按搜旧畎，特揭一门，庶使后之有志者可按图而得之焉。（卷二十六）

这简直是对唯知朘削民生的恶官吏给以当头一棒。他对立寺观一门也自有深意：

自佛老氏出，摩荡掀舞，环一世而趋之，斯道殆薄蚀矣。粗之为祸福，使愚者惧；精之为清静寂灭，使智者惑。盖其窃吾说之似，以为彼术之真，如据影搏物，而熟视之则非也。以故台之为州，广不五百里，而为僧庐道宇者四百有奇，吁，盛哉！……今各录之，非以滋惑，亦使观者知彼之盛，而防吾之衰，庶少补世教云尔。（卷二十七）

这些话虽是站在儒家立场上说的，但在当时士大夫们外儒内释的流风广被成灾时，他独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不说是难得的。其它识见高迈，用意深长的地方还很多。所有这些，又使这部方志有了一种批判的力量，形成一种较好的传统，使这部志成为一部名志。

《赤城续志》〔注9〕、《赤城三志》〔注10〕均为林表民撰。林字逢吉，临海人，与陈耆卿友，年辈稍后于陈，曾助陈采集志料，并编《赤城集》以辅《赤城志》。林编的这两部志篇幅都不多，《续志》八卷，《三志》四卷，而且都在《赤城志》刊出后不到十年相继出现。当时，陈耆卿还在世，因此，这两部续志的出现是很奇怪的。惜书已不存，难以详究。但从吴子良（1198—？）、王象祖（1164—1239）二序中还可推知一二。大概编《赤城志》时，林表民手上还有一批资料，《赤城志》“难悉录”，而不录又“不欲弃”。刚好碰到继齐硕任知台州事的王挺也想借方志以表功绩，于是两人一拍而就，把他掌握的资料编成《续志》。至于《三志》，则因绍定二年（1229）“大水漫城”，曾知州事的叶棠“再造有邦，复裨为《三志》”，完全为纪功

而作，内容也只城筑、灾异、纪功等门，较之原志，其立意高下尚可概见。

(三)

元代台州方志其名可考的为五种，都属台州总志，其书均佚。其中章嘉修《天台郡志》及不知撰人之《台州路志》，临海项士元在《台州经籍志》中疑其即为一书。而杨敬德《赤城元统志》与杨大中《赤城志》，我们也疑为一书。看来杨敬德的《赤城元统志》是确实的，而杨大中的《赤城志》，要么是一人异名，要么是事迹误记。首先，说杨大中撰《赤城志》的是《〔嘉靖〕临海县志》，其材料据说来自《明一统志》。但比《嘉靖志》早的谢铎《〔弘治〕赤城新志》却没有采用这一说法。可见谢氏对此已持否定态度。其次，杨敬德《元统志》自序说自己曾“居禁林十年，咸职太史氏”，而有关杨大中的资料则说他在元时曾为秘书著作郎，明太祖召见，“以老聩归”。可见二人所做官和生活年代两两相合。以此而各自撰志，却互不相闻，理不可通，因此疑为一书，理有或然。这样，元人所撰志实际上只剩三种，即李洵孙的《重修台州图经》〔注11〕，章嘉的《天台郡志》和杨敬德的《赤城元统志》了。

李洵孙（1243—1329）是由宋入元的，字甫山，号霁峰，宁海人。他的书片语无存，惟用“重修”之名，则可推知前此已有台州图经存在。其书与《〔嘉定〕赤城志》当属两个系统。据黄潜《霁峰李先生墓志铭》，（见黄氏著《黄文献集》），此书当时列为官书。

章嘉的《天台郡志》〔注12、13〕，谢铎《赤城新志》用了“今废”两字。章嘉是永嘉人，至治间（1321—1323），

台州路总管赵凤仪聘他修此志，书成，“不满于邦人”。其原因则杨敬德《赤城元统志·自序》云：“永嘉章君翥，取成书（指《嘉定东城志》、《续志》、《三志》三书一一引者）而改作焉，尽去其旧，而命曰《天台郡志》。夫千年之事，数贤侯之力，陈、吴诸君子搜抉讨论之精，一朝而泯焉，此邦人所以不宁！”这里，杨主要是指章对旧志的彻底改作致引起人们的不满，却没有在其它方面指出短长。这似乎是一种“器惟求旧”的思想在作怪。我们倒认为章的这部志如果是在体裁上作一种新的探索，那是无可厚非的。不过天下也不乏点金成铁者，这便难论成败了。此书到成化间卢守仁撰《台州郡志稿》时尚存三册，弘治时已不见，现在已无法作进一步的研究。

杨敬德的《赤城元统志》〔注14、15〕作于元统二年（1334），其书上起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是承《赤城三志》而作的。此书成化时尚全，据云弘治时谢铎修《赤城新志》已不见，但杨敬德的自序却被谢铎收在《赤城后集》中。是否不见就很难说了。杨的自序说：“《赤城元统志》者何？作于有元元统之二年，上以昭前修之笔削，下以迪后人绍述于将来也。”这就是说，他是要把这部书继嘉定等志成为台州方志的正统。但是他又说：“郡乘，古侯国之史也。其著星土、辨躔次而休咎可征矣；奠山川、察形势而阨塞可知矣；明版籍、任土贡而取民有制矣；诠人物、崇节义以彰劝惩，而教化可明矣，此其大凡也。”从这里可知，这部书的作者完全是从统治者的需要着眼，并把封建道德伦理观念及气运休咎之说塞进了书中，其立意就比陈耆卿不知落后了多少步。宋元理学的坏影响，在这些地方开始反映出来。

(四)

明代台州方志共有二十二部，而失佚的有十七部之多，现存的仅谢铎修的《赤城新志》、余宽等的《〔嘉靖〕临海县志》、牟汝忠等的《〔万历〕黄岩县志》、顾震宇等的《〔万历〕仙居县志》、叶良佩的《〔嘉靖〕太平县志》，计五部。虽然失比存多，但它们都处在一定的发展过程中，彼此的因袭、取舍、得失关系还能借存者知其大概。

明代台州府志原有六部，存者仅《赤城新志》一种。《新志》之前，有未详撰人的《台州府志》〔注16〕和卢守仁的《台州郡志稿》〔注17〕，《新志》之后有王启的《赤城会通记》、王宗沐的《〔嘉靖〕台州府志》和陈函辉的《〔崇祯〕台州府志》。《赤城新志》〔注18〕刚居中央。作者谢铎（1485—1510）字鸣治，号方石，太平（今温岭）人，天顺四年（1460）进士，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他撰《新志》时，据说旧志存者仅《〔嘉定〕赤城志》及卢守仁的《台州郡志稿》，其它志都已不见，但台州六县已均有县志。他是把《新志》直接衔接《嘉定志》的。起于宋嘉定十七年（1224），终于明弘治九年（1496）。

“惟图、谱、表三卷则兼采旧志，以总要所在，而不容以年断也。补遗、考异二卷每因旧志以作，而间及于今。”（谢氏自跋）实际上，风俗、宫室、典籍也是不以年断的，又去旧有的寺观、仙释等门，因此所续的仅为版籍、水利、学校、公廨、人物、官守、职役、祠墓等八门。作为续志，这个体例是可以的，问题是与前志相较，谢氏是前进了，还是落后了，优缺点究竟如何。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赤城新志》在主导思想及技术处

理上都有许多不足之处。谢氏是一位理学家，因此有许多迂阔之见。洪颐煊在《台州札记·序》中曾评他“沿宋人讲学流派，高谈心性，即是伟人，文学政事，略置弗论。”他不续仙释、寺观，是为了辟异端，但却否认了事物的客观存在；他特别注意尊君上，陶凯、方克勤（二人均台州人，方克勤为方孝孺之父）都是被明太祖杀了的，杀得不对，却“为君讳”一字不提；他又提倡“春秋诛心”，斥责对发展台州文化有大功，本身又遭冤抑的郑虔“污安禄山伪官”，为来济的“罪人”（来济在唐高宗时谪任庭州刺史，突厥入侵，来不戴甲胄驰入敌阵而死，而郑虔在被安禄山俘虏时却没有死，便说他是来济的罪人。）；他在人物门中创立孝义、贞节二目，收集材料达一卷之多。其次内容粗疏。可能由于谢氏晚年著书，精力不继，许多地方浅尝辄止。这一点从王棻为作《校注》及黄瑞、王舟璠均为作《校按》可知。某些考证也带有主观随意性，如否认章安曾是古郡县治所。他的理由是“滨海薄山，鱼龙所腥，豺虎所穴，于是而奠城社、聚市廛以为州邑，可乎？”因此结论是“理所必无”。所有这些，都使他的文献价值降低。不过创立典籍一门，是他的贡献。

谢氏初撰此书时，距卢守仁《台州郡志稿》成书仅十一年。卢氏修志时，章嘉、杨敬德等志均尚可参考，而出川地理皆所亲历。所以清·秦锡淳称他为“亦不轻下笔者”，可见其基础较厚。谢氏续书实际即以此志为蓝本，他却模稜言之。谢氏书的倾向性，杨敬德志也已存在。

《赤城会通记》〔注19〕为王启所修，章岳、李迥、王鉴编次。王启（1468—1535）字景昭，号学古，更号东瀛，黄岩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官至

刑部右侍郎。（按：《四库全书总目》云王启字柏山，官刑部尚书，皆误。柏山为王氏祖居地名。）他的年代仅后谢铎三十多年，《赤城新志》之成，王氏中进士已十年，所以他是及知谢氏的。他修《赤城会通记》，在嘉靖三年，是因为他嫌谢志及《〔嘉定〕赤城志》“世次不分，人物难别”，无法“意中了了，一览无遗”，因此他想把两志“会通”，在体裁上进行改革，也对人物作出评论。这是一种大尝试。由于原书现不可见，其得失暂难确断。但借助前人评论，还可略知其概。《四库全书总目》云：

是编取陈耆卿《赤城志》、谢铎《赤城续志》诸书录为一帙，而变其体例。自夏后氏迄明（明当作唐——引者），每朝各为一纪，唐以后则一帝为一纪。其载官吏则分名宦、死难、儒臣、有事实官、无事实官、有疵官诸目，纪人物则分乡献、死节、孝子、烈女、乡谬诸目，散入各纪之下。又有异闻、祠庙、乡试、贡荐诸目，分析破碎，殊无体要。至山川分野无可附丽，则举而列之夏后氏纪，亦可见其例之窒而难通矣。（卷七十三）

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书其实是断代综叙体，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人物则错出其间，且加分类标识，别具匠心。《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说此书“以世代先后为次，文简事该。”臧学标《台州外书》云：“志例多举善，而此书兼志美恶，存好恶之公，亦是为后来之鉴。”由此可知，四库馆臣以支离破碎，窒碍难通评之，根本不得其要。臧学标《柏山王氏族谱序》说王氏另有《黔中图记》，“事事考核，具有体裁”，也可见他决非孟浪下笔。

王宗沐的《〔嘉靖〕台州府志稿（拟名）》一目，是

最近发现的。1986年6月，临海市博物馆在市郊山宫征集到一方明·蔡云程撰的《浙江参将张公（按：名铁）墓志铭》，其中提到王氏曾应“毛郡侯属”葺过“郡志”，志中载有张铁之父端及母李氏“忠节”之传，时间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四月以前，才知嘉靖间尚有此志。王宗沐（1523—1591）字新甫，号敬所，临海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官至刑部左侍郎。曾总督漕运和巡抚宣、大、山西等镇，是嘉、万间著名的政治家和史学家。修志时王正家居侍父，在此期间他还撰成了《宋元资治通鉴》这部大作。毛郡侯名术（按：术为本字）。他曾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补板重刊赤城新旧志，次年离开台州知府任。从他重刊赤城新旧志这一举动推测，王氏所撰可能只是续志性质，即续《赤城新志》。从他四十五年离任这一点看，可能是此志不得刊行以至淹灭的主要原因。王氏的才识和文笔都是嘉万间台州第一，此志的失传很是可惜。

还有陈函辉的《〔崇祯〕台州府志》，亦失。

陈函辉（1590—1646）字木叔，号寒山，临海人。他撰的《〔崇祯〕台州府志》起草于崇祯五年（1632）五月，脱稿于六年（1633）三月，书成，旋在一次兵变中被毁。在此之前，陈的伯祖洛范、父三槐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已撰成《台岭人文志》十卷。此书曾经函辉“重补”，故《崇祯志》的人物、征辟、科目等门即以此书为蓝本。（洪若皋《〔康熙〕临海志》说：“陈寒山所修志即此。”不当。）

《台岭人文志》，其取名据陈洛范自序云：“不曰赤城，曰台岭者，著乡前修与台争高也；不曰人物，曰人文者，著天下化成赖是物也。”后一看法，极有见地。原来计

划也是修志，但少人支持，因仅成此。其意则以《嘉定赤城志》“地理详而人物较略”，《赤城新志》虽“山川略而人物差详”，但嘉定以前仍缺不补；且“一代有一代之人物”，必须“时修以代录之”，所以他们做的是统志的工作。这部书也失了。

陈函辉曾官靖江知县，在任开团河，建石闸，注意农本，颇有事功。崇祯十四年（1641）修成《靖江县志》，从志序中可以看出，陈氏的修志，着眼点是比较高的。他说：

郡县不得废志，犹国不得废史。武侯相蜀，不置史官，君子遂有“杞宋无征”之恨。……某重葺是志，以述者之事，体作者之心，以条理之终，成条理之始，以旧令尹催科之拙，启新令尹抚字之思，（这里指陈氏建设农田水利，发展生产，以使赋税及时之美政——引者。）虽沾沾然有一时裁成之喜，而亦颇漫漫然有百年无事之求。吁，难言矣！……偶与友人登孤山而眺景物，大块之有靖，一沧海浮沓耳；浮沓中，物力奚若？比者海内多事，靖之田赋亦几视通都大邑，与日俱增；而又旱魃频仍，飞鸿满野，人不聊生，民者难乎其为新矣。安得还天下于仁寿之域，如汉文赐民田租之半，而还吾靖以新造之年，民庶几有瘳乎！某不佞，匪止在靖谋靖，推之放诸四海而准，不可知也。

这就是封建时代所谓的“仁人之心”。由此推想，如果《〔崇祯〕台州府志》尚存，或许也有可观的。陈氏后辅鲁王抗清，事败自杀，其精神人格亦是可佩的。

(五)

明代台州各县县志也已广泛出现，计存目十六部，现存四部。

明代修志有两次高潮，一次是永乐年间(1403—1424)，一次是万历年间(1573—1620)。永乐开始修《明一统志》，那次的修志高潮是为纂修《一统志》铺路的，有朝廷的统一部署。万历的高潮，其背景可能与当时台州的人文发达有关。

明代的临海县志共有三部。最早的《永乐志》只字无存。弘治(1488—1505)末，任稜等撰《临海县志》〔注20〕时即已不见，所以清·洪若皋撰《〔康熙〕临海县志》即称临海有志自任志始。任志亦失，只存一篇吴珏(1445—1520)写于弘治十七年(1504)的序。吴序云：任氏自南国子学录归，因“阅重修郡志，(指《赤城新志》——引者)慨临海为郡首邑，而其间百凡记载，率多缺略，乃谋诸同志士夫，各举遗漏，补而足之，别为邑志。”可知任氏是因谢铎所修郡志存在乡土偏见而自行纂辑的。

任志的撰人，据各家书录，还有吴珏。然在吴氏序中并无反映。最近发现周玉撰的吴氏墓志铭，也只说吴“校刊《临海志》”，这个问题算解决了。

第三部为《嘉靖志》〔注21〕，余宽、金贲亨撰，蔡潮、应大猷序。余宽(?—1526后)字中立，或作仲栗，一字约中，正德六年进士。金贲亨(1483—1564)字汝白，原从外家姓高，后复姓，正德九年进士。二人均明代临海的理学家。此书前代目录学家曾误分为三部，一作余宽